会员通讯

2015 年第 5 期

（总第 49 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2015 年 5 月 30 日

目　录

工作动态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应约会见诺基亚执行副总裁巴里·弗兰奇……（2）

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3）

陈文玲总经济师与美国会议员助手代表团交流……（3）

国经中心举办第 71 期“经济每月谈”活动……（5）

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出席“2015 澳中国际资本峰会”……（6）

权威言论

魏礼群：“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新机遇……（8）

张晓强：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机遇……（12）

戴相龙：中国银行业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18）

张国宝：储能影响未来能源大格局……（23）

郑新立：海外投资应优选战略和战术……（29）

魏建国：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确定第三次改革开放大战略……（33）

张大卫：河南要在改革开放上布更大的局……（40）

成果摘要……（46）

国际交流……（51）

[工作动态]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应约会见诺基亚执行副总裁巴里·弗兰奇

5 月 7 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应约在国经中心会见诺基亚执行副总裁巴里·弗兰奇，双方就电信业发展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国经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以及诺基亚大中华区总裁王建亚、副总裁马涛等在座。

张副理事长简要介绍了中国电信业发展情况，指出从 2003 年开始，中国的移动电话数量就开始超过固定电话数量，电信业务数量、网络规模上有了很大提高，并带动通信技术服务市场规模的高速发展。当前，3G 在中国的应用已经成熟。随着 2014 年向中国移动发放 4G 牌照、今年 2 月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 4G 牌照，中国的 4G 用户数量不断增多。未来几年中国通信技术服务市场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张副理事长表示，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去年以来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持力度。

弗兰奇表示，中国通信服务市场的发展给诺基亚带来了巨大机遇，诺基亚将继续加强在华业务。弗兰奇赞赏中国政府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高度重视，表示愿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信息与国经中心保持沟通。

双方还就有关通信技术创新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交流。

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

2015 年 4 月 23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一行。国经中心交流部部长许朝友、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诺德厚、国别主任白桦等陪同会见。

徐浩良简要介绍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商务部新签的战略协议情况。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将举办 2015 后发展峰会，中国国家领导人将与会。中国可充分认识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支持联合国发展系统，增加财政支持，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UNDP 非常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希望与发展峰会相结合。

魏副理事长介绍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沿线国家实现“五通”等相关情况，表示国经中心愿继续与 UNDP 加强合作，共同为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

陈文玲总经济师与美国会议员助手代表团交流

4 月 2 日，陈文玲总经济师在国经中心与来访的美国会议员助手代表团 12 位成员进行交流。战略研究部部长田青、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交流部部长许朝友及有关研究员等陪同。

该团由美亚学会组织，主要由美国会参众两院金融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议员办公室主任组成。

陈总经济师应询就中国经济新常态和经济发展新动力作出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三十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贡献达到三分之一，绝对增长量比之前要大很多。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是动力转换。创新驱动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近期将推出“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创新驱动的新型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内需、市场红利、中国城市化、新的人口红利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互联网上升为成国家战略，互联网新兴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改革开放也将创造非常大的发展动力，加快推进自贸区试点，继续推进中国与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沿线国家实现“五通”。中国将强力推进政府权力下放。

双方还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交流了看法。

国经中心举办第 71 期经济每月谈

2015 年 5 月 19 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办第 71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主持，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贾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梁云凤发表主旨演讲。

刘克崮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三中全会提出的稳定宏观税负，即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值不变。2012 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是 31.75%。贾康表示，在推进全面改革过程中，十八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链条，其关键词：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二是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三是现代财政制度，四是现代政治文明。财税体制改革要在总体的框架上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层级之间、整个政权体系的内部关系，理顺事权，把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以及处理好收入划分、财力分配通盘理顺体制关系的问题。高培勇认为，把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中的突破口和主线索，其用意是要以财税体制改革破题，以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铺平道路，由此来推进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梁云凤认为，中国房地产业重复课税比较严重，营业税与增值税之间，

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之间也存在着重复课税。她建议，在降税清费基础上构建地方主体税，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适时推进改革。

演讲结束之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出席“2015 澳中国际资本峰会”

4 月 22－26 日，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应邀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市举办的“2015 澳中国际资本峰会”，并发表题为“China-Australia FTA Could Create Opportunities to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的主旨演讲。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部长及立法院副领袖 Hon John Ajaka、联邦参议院经济指导委员会主席 Sam Dastyari、新州上议员王国忠、悉尼市议员郭耀文、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普华永道亚洲业务部主管合伙人范信德、中澳传媒集团董事总经理李思超等发表演讲。来自中国和澳洲的 300 余位专家学者和工商界人士出席会议，与会者围绕“中澳投资机遇与地缘政治”“亚太金融市场规则开放与融合”和“离岸 RMB 中心与双边金融服务机会”等主题充分展开学术交流和研讨。

徐洪才认为，中澳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近年来中澳经济合作加深，贸易范围扩大，中国对澳投资增加；中澳 FTA 的签署是两国

经贸合作的里程碑，将会创造新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机会。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为中澳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对澳洲的产品和服务有强烈的需求。在中国推动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中澳经济合作将会加强。徐洪才建议，继续加强中澳在传统的农业、能源和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同时围绕“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展开多层次的合作，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两国智库的积极作用。

[权威言论]

“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新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魏礼群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高瞻远瞩、寓意深刻，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性新特征作出的科学论断。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概括了新常态九大特征，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常态”意味着发展的机遇与新的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的风险与挑战。我国经济发展能否在新常态下实现新的目标，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问题。

适应新常态，必须正确认识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目前已开始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粗放型增长转向质量集约型增长，结构调整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与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一时期既充满新机遇，也充满新挑战。现在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这既需要政策调整，更需要全面深化改革。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这不仅需要时间成本，而且需要巨大的物质成本。改革进入攻坚期，必须通过改革化解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通过技术创新与产

业升级等推动经济高效增长，这需要下更大气力和决心。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有清醒认识，积极适应发展新常态，戒除焦虑心理和烦躁情绪，保持战略上的定力和发展的平常心态，聚焦发展问题，认真练好内功，为推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适应新常态，必须努力把握新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作了全面、系统和准确的概括。可以说，这九种特征反映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全貌，也是新常态面临的重要机遇。目前，经济增长虽然下行压力很大，但仍然处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会创造出更多、更新的市场需求，还会带来更全面、更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需求结构再平衡，为我国经济提供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结构调整、转变方式、创新驱动都孕育着新的机遇。从区域发展来看，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回旋空间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必将助推新一轮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要辩证看待新常态，把压力变动力，把潜力变活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心一意谋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适应新常态，必须创新发展新思维。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追求高速增长；习惯于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能源消耗严重，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严重；习惯于政府主导方式，依靠政府短期政策红利，依靠政府吃小灶、开绿灯，依靠政府大包大揽。要适应发展新常态，必须从传统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在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方式上尽快加以调整。要从盲目追求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从注重要素投入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依靠科技进步，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科技含量，推动经济由数量发展转向质量发展；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适应新常态，必须实现改革新突破。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亟待突破，包括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解决市场秩序不规范、规则不统一、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引导、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问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财权事权合理划分问题。这些都关系到能否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适应新常态，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在各

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将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适应新常态，必须乘势而上有新作为。无论是应对挑战还是用好机遇，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创新驱动，根本问题还是靠实干。事业是干出来的，等靠要不行，不作为、慢作为更不行。适应新常态，必须乘势而上，引领新常态，敢于担当，有新作为，有大作为。适应新常态，需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主动作为的工作状态，需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的改革勇气。当前，要坚决破除畏难情绪，破除观望心态，破除一切不适应新常态的思想意识，对一些不作为、慢作为和懒作为现象，要敢于问责。否则，改革畏首畏尾，发展瞻前顾后，必然影响经济发展既定目标和长远目标的顺利实现。

适应新常态，赢得新发展，任重道远，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国家行政学院范迪军和深圳龙岗行政学院杨刚勇同志合作汇编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案例选编》，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常态重要论述的成果。书中的案例主要从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征集和遴选，许多案例来自基层一线，体现了改革探索的精神，是适应新常态的生动写照，希望这些案例能够为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来源：2015 年 03 月 11 日，人民网）

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张晓强

“2015 中国新兴产业发展论坛”作为科博会的重要活动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出席并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一、近年来中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2014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以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七大领域、二十个重点行业的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收入达到 16.3 万亿元，实现的利润近 1.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13.7%和 17.6%。这七大领域不完全是工业，我拿它和工业做一个比较，比同期工业的主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水平高了很多。主营业收入比工业高 6.7 个百分点，利润增长，高了 14.3 个百分点，去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3.3%。

新增的风电装机是 2000 万千瓦，占全球新风电装机的 40%，居全球首位。4G 手机国内销售量，从 2013 年的 1000 万部，跃增到去年的 1.7 亿部。北斗卫星的民用数从百万级升到千万级，电子商务交易额快速发展，一年增长 25%。可以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面临着下行压力形势下，新兴产业为稳增长、增就业、促升级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逐步增强。

二、加快新兴产业发展仍有很大的空间

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活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引领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占经济的比重还比较小，占工业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几。在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提出，到2015年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中国GDP比重达到8%左右。目前看，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但是相对于现在产能过剩产业下滑，一些传统产业增速大幅降低，这样的严峻局面，即使新兴产业这七大领域二十个重点行业达到8%的目标，恐怕它还难以填补其他方面下行的影响。因此从经济新常态下，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要提质增效的要求看，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是今后一个时期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现在所面临严重的资源环境约束、产业升级的紧迫要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事业发展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都在为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提供重大的机遇。比如现在严重的雾霾、严重的污染需要治理，对于能够提供相应的技术、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的企业而言，恰恰就是重大的商机所在。中国正在推进能源革命，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峰值时，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要达到20%左右，这对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展意味着世界最大的市场。去年中国快递业的件数增长了52%，达到了140亿件，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背后实际上是反映着需求的强劲。所以，从发展的角度看，新兴产业的机遇非常大。

三、实现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三个重要原则

1、坚持需求导向，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深入把握市场需求，增强企业活力。这些年发展快的产业，包括电子商务和快递，新一代移动通信与互联网、风能与太阳能，都是顺应了市场的需求，同时各类企业积极开拓进取。诺基亚公司现在主营业务是移动通讯的系统设备，而其手机业务，已是日薄西山了。反思一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当时诺基亚公司的管理层研究后认为，常规手机仍然有很长的生命周期，所以不必现在对智能手机有过多的投入，这一重大决策失误，对一度占全球手机市场份额 30%以上的诺基亚手机业务产生致命性的后果。原因还是严重地背离了需求。

2、坚持与时俱进，重视创新驱动。因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乃至于资本投入都是有限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国都在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在什么地方？现在看，科技创新发展有突破的，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这些，都是普遍看好的领域。

几年前德国提出了工业 4.0，得到了各方很高的评价。我个人体会，德国的工业 4.0，它的核心还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如果从方向上看，我们是在党的十七大，2007 年就已经提出要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在 2008 年组建了工信部，李毅中同志

就是首任部长，几年来通过多种措施，我们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几年则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最近因为要制定这个计划，很多专家、领导都在研究，就互联网+的内涵以及如何有效地实施它广泛讨论。我个人的体会是一定要有广阔和前瞻性的思路，一定要抓住能够有效实施的关键之处。所谓广阔和前瞻性，就是，当我们在研究考虑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时候，应该以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重点，但是绝不应该仅限于此。应该考虑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多行业、多领域的有效结合与应用，包括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与农业发展，节能环保、医疗、教育、物流、新兴城镇化的有机结合，这样就把它的发展空间放宽了。我的互联网+是一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与经济社会的多领域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它就能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所谓抓住关键，我想就是要使我们新兴产业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计划切实做到基础坚实，科学合理对关键技术、设备、软件实现突破，保障信息安全，避免受制于人。最近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是一个热点。大数据、云计算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对海量数据可以进行及时有效地深度挖掘，从而形成能对多个行业、多个企业发展都很具有价值的数据体系，以及一种开放共享的机制，再通过宽带、

互联网网络高效的传输，来更好满足各领域的发展需求，促进效率效益的提升与可持续健康发展。如果只是简单化的各个部门、各个省区市、各个行业都大建云计算中心，而不能有效地进行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共享共用，那就很可能造成全国范围的轰轰烈烈的信息中心大升级，这样可能会造成新的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

3、坚持发挥政府的作用，营造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好环境。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我们现在财政对基础科研投入力度还要加大。大家老说基础科研经费使用不合理，要通过改革提高科研经费的管理与使用水平。要通过设立更多的专业性、国家新兴产业的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并带动社会资本，更有力地支持新兴产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初创期和早中期的发展，要通过制定科学的财税和价格政策，来促进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健康发展。

比如上网风电价格怎么定的科学合理使它能促进风电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现在有一定补贴，还有其他一些政策来促进它的发展。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力度，完善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刚才几位领导讲到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这里涉及到怎么能够通过调动科技人员与企业创造知识产权的积极性提高转化率，解决好我们多年存在的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顽症。现在正探讨，企业或者科技人员对知识产权成果的处置权要提高，知识产权

做质押贷款等等一系列措施，把创造的积极性和使用转化的机制健全起来。

特别应该重视的是，就是要切实落实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所提出的，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新兴产业和创新，既包括新技术、新产品，也包括新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的创新。我国电子商务和快递业的高速发展，可以说与政府机构营造的良好宽松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马云先生发展的很好，但是大家注意，在这些年政府对他没有什么收税，没有像实体商业二十多个部门天天检查他，收费等等，是个很宽松的政策，不收税，放水养鱼。所以他讲感谢政府这些年不管我。不管也是政府一个政策，就是给一个宽松的环境。今后要进一步破除限制新商业、新模式发展的障碍，比如对药品、医疗器械的商品，要有高效的监管模式，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要不然创造出来的医药不能用。对新能源这些领域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准入政策。

5月7日，国务院刚刚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意见》，明确了积极推动作为支持发展的原则，要求即使在商业模式创新、关键技术研发，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引导力度。大家可能记得去年、前年互联网金融发展，传统金融行业有很大意见，说要收拾他们，说他们在灰色地带，负面影响很大。克强总理说对新业态要宽容，当然也要规范。我今天

早上还在看，对滴滴打车，有不少争议。我觉得对新业态允许它发展，冒出一个东西，跟我传统出租车管理体制不符合，你就是非法经营，就要收拾你，那就搞死了。对鼓励电子商务发展，反映了国家积极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很明确的方针。

综合上述，中国新兴产业发展有了一定基础，又有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会使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所以只要企业家们勇于开拓进取，善于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中国新兴产业必将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来源：2015 年 5 月 13 日，新浪财经）

中国银行业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戴相龙

1995 年 6 月 15 日至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此后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会议召开 20 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戴相龙，他是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市长、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曾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天津市的发展、全国社保基金的管理作出了贡献。

戴相龙很高兴地回答了记者有关不断改进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问。

朱镕基同志高度评价这次会议，指出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记者：你如何评价 20 年前召开的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

戴相龙：1995 年前，我国四大专业银行的属性，既是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又是办理银行业务的金融企业。这些银行基本上按国家计划和当地政府要求发放贷款。1992 年全国经济过热，金融秩序十分混乱。银行内部管理松弛，没有适应银行业特点的会计、利润、考核制度。由于上述原因，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四大专业银行实际处于资不抵债的困境。针对这种状况，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的批示，我负责筹备召开了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增强各家银行总、分行行长货币经营的观念，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 4 家银行在 2 至 3 年内，把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平均比例，从 20.4%降到 17%以内。1995 年 6 月 19 日，朱镕基同志到会讲话，提出要把银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上来，尽快把我国专业银行办成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商业银行。通过这次会议，增强了全国银行业领导人忧患意识，开始清查各家银行不良贷款底数，改进不良贷款质量划分标准，提出各

家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的目标。这个会议对后来推进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镕基同志高度评价这次会议，指出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曾和一些专家设想设立若干个“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基金”

记者：结合此会召开后的20年实践，你认为如何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

戴相龙：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是银行业的永恒课题。我国银行业生于忧患，发展于改革，成效于管理。

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要有忧患意识。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过高，轻则发生挤提存款，重则造成银行破产，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威胁政权稳定。因此，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处置银行隐患。1996年8月，中央领导集中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化解我国财政、金融、就业、粮食等风险的汇报。1997年11月，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改进我国银行业党的领导体制，整顿金融秩序，推进金融体制改革。2002年2月，又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2007年、2012年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改革、提高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坚持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中国银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连贯、有效的过程。1995年把4家专业银行的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基本分开，成立4家商业银行，3

家政策性银行。2002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对 4 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并陆续上市。当时，我曾和一些专家设想设立若干个“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基金”，吸引公众资本投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后来通过外国战略投资者投资参与 4 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实践证明，这样做更有利于吸收国外银行业先进管理经验，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

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还需要国家帮助国有银行逐步解除历史包袱，为其改革创造条件。1998 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向 4 家银行发行 2700 亿元特别国债，用发债筹集的资金向 4 家银行注入资本金。1998 年、1999 年国务院先后批准 4 家银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再由资产管理公司按原价收购相关银行不良贷款 1.4 万亿元。2003 年以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国开行、光大银行累计注资 1017 亿美元。以上所有操作符合相关法规，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先后上市创造了条件，成为国际上的成功案例。

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要制定一系列适应商业银行发展的贷款质量分类及信息公开、会计核算、坏账准备等管理制度，要有稳健、守信、敬业、稳定的经营管理团队。

记者：你如何评价当前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

戴相龙：欧美国家商业银行历史悠久，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有较为完善的商业银行管理制度，长期以来经营管理水平高于中国

银行业。但经历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这些国家商业银行一些重要经营管理指标水平下降，现在正处于恢复中。与此同时，经过 20 年不懈努力，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与欧美国家银行业的差距不断缩小。综合分析 2014 年底我国 4 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指标，我认为我国目前大型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接近、相当于欧美国家老牌商业银行，有些指标已处于领先地位。按照一级资本排名，2013 年全球前 20 家大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分别名列第一、第五、第九、第十名。中国工商银行市值、核心资本、总利润已经几年名列世界第一。

2014 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 1.25%，拨备覆盖率为 232%，贷款拨备率为 2.9%，存贷比为 65.09%，资本利润率为 17.59%，资本充足率为 13.1%，这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充分证明我国近 20 年金融改革方向、道路、步骤、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记者：你对今后提高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有什么建议？

戴相龙：中国银行业发展正在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会减少经济发展的巨大波动，这对防范金融风险是有利的。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正在会同有关国家和地区推进“一带一路”新战略，又为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大型银行扩展业务创造了条件。现在，中国的银行，特别是大型

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与欧美国家代表性银行相比较，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最大的不足是，欧美老牌大型银行一般实行多种形式的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综合经营，而我国大型银行基本从事银行传统业务。虽然有一些银行投资设立附属保险公司、投资银行，但规模微小。因此，我建议适当加快提高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能力。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对客户特别是企业集团的综合服务效率，有利于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有利于发展我国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综合经营模式，可以是金融集团模式，也可采取银行控股公司模式。逐步做到大型银行在大中城市的分支机构都能从事综合经营业务。大型商业银行实行综合经营，执行各业经营法规，分别核算，严禁资金混用。

（来源：2015 年 4 月 28 日，金融时报）

储能影响未来能源大格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张国宝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国际能源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可再生能源异军突起，高效、清洁、低碳已经成为世界新能源发展的主流方向。但风能、太阳能发电的间歇性和不可控是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制约因素，2014 年我国风电仍有 15%～20%的弃风率。在解决

可再生能源并网难的问题中，储能产业在市场中获得了发展的重要契机。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AB2514 法案要求加州公共电力委员会（CPUC）从 2012 年 3 月 1 号开始着手确定由投资者拥有（IOU）的电力公司在 2015 年和 2020 年的电网储能目标。这项立法同时要求 CPUC 在 2013 年 10 月 1 号前接受所确定的储能目标。国有的电力公司也有相同的要求。根据这项法案确定了 130 万千瓦储能电站的目标。

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装机规模，美国与日本仍然是最主要的储能示范应用国家，分别占 40%和 39%的全球装机容量份额。美国是储能发展较早的国家，目前拥有全球近半的示范项目，并且出现了若干已实现商业应用的储能项目。美国在锂离子电池制造及系统集成方面应用较多，同时配以大规模的政府资金支持。而日本在钠硫电池、液流电池和改性铅酸电池储能技术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1 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推动户用储能作为产业扶持的重点。2012 年 4 月出台家庭储能系统补助金政策，在这项政策的支持下，2013 年，越来越多的储能系统获得补助并投放市场。

欧盟电网计划（EEGI）近期发布了《欧洲储能创新图谱》报告，对欧洲 14 个国家储能研究、开发与示范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在过去 5 年，这些国家公共投资和受到欧盟委员会直接资助的项目总数达到 391 个，总投资额 9.86 亿欧元。德国在推动储能产业方面的动作较大，2013 年和 2014 年 2 年共计划投资 5000 万欧元，对新购买

储能系统的用户直接进行补贴，目前已有30兆瓦的项目获得补贴。由于这一储能补贴计划的出台，德国在未来5年的储能装机容量有望达到2吉瓦。

根据欧洲市场调研机构EuPD的预测，德国对太阳能储蓄电池系统销售数量将从2013年的6000个上升为2018年的10万个以上，德国太阳能储蓄电池市场今后3年将会暴涨。澳大利亚矿业发达，许多工矿区是独立电网，柴油发电比例大，矿区、公共事业、家庭储能及分布式能源市场已开始全面布局，预计2030年有望达到3000兆瓦规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已成为微电网的新兴市场。这些地区海岛众多，无电人口比例大，鉴于岛屿的地理因素和经济状况，微电网成为最佳的解决方式。

到2013年12月底，我国累计运行、在建及规划的储能项目总量近60余个，装机规模超过80兆瓦，包括张北国家风光储输电站示范工程、宝清储能电站示范工程、宁夏吴忠太阳山风光储项目、辽宁卧牛石风电场全钒液流储能电站项目等。其中，分布式发电及微网型储能项目占的比重较大，如东福山岛风光储柴项目、南麂岛微网项目、西藏阿里光伏储能项目、青海玉树分布式光水蓄互补系统、三沙独立光伏智能微电网项目等。这些示范项目的实施，既有中国政府产业政策鼓励的因素，更主要是新能源发展对电网稳定的市场需求推动企业不得不建设储能装置。但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的

鼓励储能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靠企业自发建设，价格政策也不明朗，我国的储能产业面临技术、应用和市场机制的三重挑战。

美国最大跨国电力公司 AES 公司在新建电厂时十分重视配套建设储能电厂。其在智利建设一座 20 万千瓦火电厂，要配套建设 2 万千瓦储能电站。储能电站投资高昂，为什么还要建设储能电站？他们的理由是，智利矿山用电需要稳定。该公司参与加州燃气轮机电站竞标，条件之一就是要配套建设 10 万千瓦左右的储能电站。而我国电力企业在投资风电、太阳能发电时，目前还很少主动去考虑建设储能电站。

我国现阶段四个与新能源相关的重要领域，分布式发电与微网、辅助服务、用户侧需求响应和电动汽车并网系统开始涌现储能的商机与经济性。储能产业在我国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国内储能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储能市场。虽然现阶段还没有与储能相关的政策体系和价格机制，但储能是一个新兴产业，已越来越受到政府能源部门和科技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应用示范的财政补贴也在逐步推进中。

截至 2013 年底，中国已运行的储能项目装机规模达 51.5 兆瓦，较 2012 年增长了 39%。快速增长涉及可再生能源并网、分布式发电及微网、电动汽车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分布式发电及微网领域，无电人口用电问题的解决、海岛可持续能源体系搭建、分布式光伏的启动，都为储能开启了大量商机。

2013 年底，全球共有 40 个风电储能项目（含运行、在建及规划中项目），装机量约 241 兆瓦，2/3 的项目分布在欧美国家。其中美国的风电场储能装机规模占比最大，欧洲电池储能技术在风电场中的应用处于初级阶段，中国逐渐开始开展风电场储能示范项目。锂离子电池、先进铅酸电池、液流电池和钠硫电池是风电场储能中应用最多的四种技术，在项目数量、装机容量方面，份额都超过了 80%。

分布式发电及微网日益成为能源领域的应用热点之一，按照国家能源规划，到 2020 年，分布式发电的装机容量将达到 2.1 亿千瓦，占全国总装机的 11%，而储能将是分布式发电微网的关键支撑技术。储能在分布式发电及微网中主要起到稳定系统输出、起到备用电源作用以及提高分布式发电系统调度灵活性。分布式发电及微网项目主要应用于社区、工业、商业、用户、偏远地区、军用等领域。其中，社区类的项目数量是最多的，占所有项目数量的 50%，主要分布在美国和日本。其次是海岛和偏远地区类储能项目，分别占总项目数量的 12%和 9%，主要在中国和美国。

美国是开展储能调频项目最多的国家，比较知名的项目有纽约州 Stephentown20 兆瓦储能电站、AES 纽约州 8 兆瓦储能电站等。智利也开展了一些调频储能项目，如 AES 公司在智利北部电网投用的三个储能项目。中国也开始进行储能调频电站试点。2013 年 9 月，

中国第一个调频储能电站北京石景山热电厂电池储能项目正式投运。

北美、欧洲、亚太地区是储能项目开展较多的地区。美国拥有全球近一半的示范项目，2013 年投运了几个装机规模较大的项目，如 AES 位于 Dayton 市的 40 兆瓦调频项目、毛伊岛 10 兆瓦风电场项目等，使其全球装机规模首次超越日本，位居第一。欧洲近几年计划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相继在 2013 年开展了若干项目，涉及输配、智能城市、海岛微网等领域，特别是德国目前已有 30 兆瓦的项目获得补贴。日本储能项目装机容量仅次于美国，仅 NGK 公司的装机量就超过了 300 兆瓦。

中国储能项目近两年发展较快，分别在可再生能源并网、分布式发电及微网以及电动汽车等领域部署了一些储能项目。从应用上看，按装机容量分，储能在可再生能源并网领域的比例最高，占 51%，电力输配、分布式发电及微网以及辅助服务也是应用的重点领域，分别占比 19%、8%及 16%。伴随着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储能技术市场成为了一片“蓝海”。中国风能、太阳能处处都有，但不是时时都有。瓶颈是储能，储能技术在其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从技术上看，截至 2013 年，钠硫电池的装机比例仍旧最高，约占 45%，其次是锂离子电池和铅蓄电池，分别占 32%和 12%。全钒液流电池也开始应用于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的调储。

2013 年，中国储能项目累计装机容量从 2012 年的 47.7 兆瓦上升至 64.9 兆瓦，增长率为 36%。

随着越来越多的示范项目在中国运行，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储能市场规模将达到约 136.97 吉瓦(其中包含抽水蓄能、储热等技术)，占 2020 年全国发电总装机量 1800 吉瓦的 7.6%。

可再生能源是今后能源结构调整的方向，但只有储能问题解决了，我们才可能真正迈进可再生能源的时代。真正影响未来能源大格局的是储能技术，储能技术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能源革命里面最重要的突破方向。

现在各种储能电池技术层出不穷，美国前能源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辞职后回到斯坦福大学研究加密锂电池。钠硫、铁铬、全钒、锌空、铝空等储能电池层出不穷。储能技术正出现爆发性增长态势。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管理》（综合）2015 年 3 期）

海外投资应优选战略和战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郑新立

4 月 18-19 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第二届中国跨境投资并购峰会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表示，扩大海外投资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首先，扩大海外投资，是解决当前需求不足这个主要矛盾，消化产能过剩的客观需要。我们国家的经济运行，主要的矛盾，也就是总供求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矛盾。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行，通货紧缩，大量的产能在那里停工、浪费。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我们在宏观上采取很多政策。其中，扩大海外投资创造出口需求，是解决需求不足矛盾的一个正确战略选择。第二我国在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瓶颈约束，石油、天然气、铁矿等等资源，国内供给不足。技术，也是一个瓶颈。通过海外并购，我们可以解决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长远发展所面临的瓶颈约束。第三，扩大海外投资，也是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为我们开展国际并购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企业运行很正常。你出去并购，就没有机会。现在它面临着困难，去了以后他觉得对它是一种帮助。使被并购的企业避免破产的命运，可以实现互利双赢。所以，国际并购现在面临着千载难逢的窗口期，要抓住这个机遇。第四，我们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海外投资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包括我们成立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我们开展海外投资提供资金上的支持。第五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为扩大海外投资将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有1/3现在是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买国债的年回报率是3%左右，而且，美国人并不领情，美国国会有一个议员提出，要对中国国买美国国债收税。与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寻找其它的投资机会？我们其实有1万亿的外汇储备

就够了，理论上我们可以拿出 2 万亿进行海外投资，所以要开展国际并购，我们不差钱。

扩大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任务有四个方面，首先，要到海外去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特别是国内短缺的能源、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铝矿等等。这些资源国内虽然有一定的储量，但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全球市场上来看，这些资源并不短缺。我们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拿到尽可能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

再者，通过国际并购获得国外科技资源和营销网络，从而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国际经营的能力。然后，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来创造需求。现在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许多行业都具备了到国外发展加工贸易的能力。“四小龙”在快速发展了 10 年之后，就开始到海外投资。现在我们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包括装备制造业等，都具备了到海外投资、设厂、发展加工贸易的能力。通过到海外投资带动零部件、原材料的出口，可以创造出需求。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这是多年来的成熟发展道路。现在，我们要开始走上这个道路。最近几年我们出口的增速明显下降，我们通过海外投资就能够创造需求，使出口保持持续的、旺盛的增长。此外，通过到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全球人才来进行自主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句非常鼓舞人心的话，叫“择天下英才而用”，天下英才，不仅是中国的人才，而是全球的人才。美国为什么能在科技创新上长时间的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郑新立总结美国的经验，有四条。第一条是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制定重大工程的项目，从而能够带动不同时期的产业技术的进步。在历史上搞过曼哈顿计划，带动了核能的利用。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航空航天业的发展。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带动了互联网+发展，最近奥巴马政府又在搞新能源计划和再工业的计划，对美国经济也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个经验是充分吸收全世界的人才，利用优厚的报酬和奖学金，把全世界最聪明的、最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吸引到美国，去为美国服务。

第三个是是有风险投资机制，来支持创新。

第四，军民技术的一体化。美国大量企业从美国国防部获得每年大概 3000 亿美元以上的科研经费和军工技术，军工技术无偿转到民用当中，带来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科技正在加快发展，我们发明专利的国内申请量连续几年世界第一，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和美国申请数量也正在相近。我们要赶上、超过美国，最重要的一条是要能够吸引全球的人才。但人家不一定愿意到中国来，怎么办？我就到国外设一个研究所，吸引当地的人才。我们改革开放 30 多年，华为公司可以说是中国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公司。成功的诀窍之一，就

是利用全球的人才。在美国设的研究所主要是利用美国人才为华为的技术服务。在俄罗斯设的研究所主要是研究数学，俄罗斯人的数学能力比较强。印度设了研究所主要研究软件，印度软件工程师的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要比我们强。华为通过全球布局，在海外设立研究所，就能够“择天下英才而用”，所以华为在通讯设备制造行业，可以走在世界最前沿。凡是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如果你能把外国的科研人才吸引到中国来，谢天谢地，更好。做不到这点，我就到国外设立一个研究所、研究机构，用优厚的报酬吸引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工作。

通过工程承包，带动劳务输出和建材、施工机械的出口。包括到海外承包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特别是中东那些地方。那里工程承包的业务比较多，我们要积极走出去，扩大工程承包。我想，近期‘走出去’的任务就围绕这五项来进行。

（来源: 2015 年 04 月 18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

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确定第三次改革开放大战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建国

链接是这个宇宙演化的密码。当物质之间发生链接，它们就能够信息交换，进而就会发生演化。人类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各种形式的链接。有人与物之间的、有人与人之间的；有群体之间的、有个体之间的；有现在和过去的、有现在和现在；有和平方式的、有暴力方式的等等。

“一带一路”愿景的出炉，是中国智慧向世界展现的一种新的链接方式。它崇尚共赢、它多管齐下、它是系统的、它是清晰的。梳理历史，很难看到有这种形式的链接。

能够产生这种与众不同“大链接”的背后是中国综合能力的提升。其装备制造的发展可以让高铁、管道铺张开去；其金融储备雄厚可以为大链接提供资金支持；其自由贸易主导的理念可以为世界传递多赢；其生机勃勃的市场可以向外界提供有益的反馈。

一带一路，世界新链接。

核心摘要

“中国经过了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特区；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加入WTO，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第三次开放是“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在前两次基础上更大的开放，是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开放，中国将把最好的东西拿出去。”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公布，酝酿近两年时间的“一带

一路”指导性文件终于出台。不过，这八千多字的文件仍需要进一步解读。

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样的高层智库都参与研究，并提出不少对策建议，有些已经写入战略。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这是时隔一年多我们再次与他面对面，之前他提出的很多有预见性的观点，比如用产业园模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写入战略。

选择重点“驿站”

《21 世纪》：这次公布的“一带一路”文件称为“愿景与行动”，而不是原先我们设想的“一带一路”规划，这怎么理解？

魏建国：这就发出一个信号，说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很重视又很慎重，不像以往那样搞模式为先、规划在先的做法，而是根据不同特点对逐个国家、城市和项目进行探讨，不追求模式、时间、路径和项目上的一致，而是带有弹性的，带有共同愿望的。

《21 世纪》：那接下来怎么推进，有没有实际的操作方案？

魏建国：有，我认为下面就是由我们各部门与各个国家推进落实，通过资金、政策、项目和规划进行落实，但不是统一推进，而是各国自己可以决定。也不一定从离得最近的国家开始谈，有可能是从很远的国家开始，成熟一个是一个，条件最具备的先行。

《21 世纪》：“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公布后，内容还是与我们预想的有很多不同之处，您怎么看这个文件？

魏建国：这个愿景规划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很好的东西。

第一，它把“一带一路”一些规划和愿景细化，从时间上进行细化，规定在什么时间内完成什么项目。

第二，在程序上也很细化，争取尽快跟“一带一路”国家实行五通，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比如要尽快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签订双边和区域的 FTA（国家或地区间的自贸区），加快 FTA 谈判，也要加快和有关国家的 BIT（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还要加快和有些国家关于投资贸易保护协定的谈判。

愿景规划的发表还是有利于推动五通的具体落实，我们已经在路线图、时间表上做了细化，下一步就是落实。落实过程中我认为还是要突出重点，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 13 个国家，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 52 个国家，这 65 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开展，所以我建议选择海上和陆上的驿站。未来选 10 到 20 个驿站作为“一带一路”的支撑点重点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园就很重要。

《21 世纪》：选择驿站或支撑点有什么标准？

魏建国：主要是看对方需要，看条件的成熟度，以及政策沟通和道路沟通方面的成熟度。双方政策沟通之后，然后基础设施联通，再到货物流通和金融融通，最后到人心相通，总是有先有后。

产业园是落地最好的平台

《21 世纪》：愿景与行动提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园为什么重要？

魏建国：建设产业园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好的平台。第一，产业园是两国政府签订的，在所在国里双方合作的、各种条件具备的、有利于企业和当地税收就业等政策落实的最好平台。有两国政府的保障，避免企业走出去单打独斗。第二，产业园基础设施完善，方便企业入驻并办理当地的各种手续，包括税收、签证的办理，还有交通、原材料供应等都是产业园可以做的。

《21 世纪》：产业园是进行专业化分工，还是像以前中国所做的大杂烩？

魏建国：这个产业园是针对当地的优势而建的，不是大杂烩。这是为当地量身定做、定向打造的适合当地优势的产业园，使得合作国家的基础工业、优势产业得到发展。

要把园区打造成为当地的基础工业基地、高新技术基地、机械制造和设备基地以及当地的出口加工基地，最后打造科技研发基地。

《21 世纪》：这意味着产业园有一定的准入门槛？

魏建国：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走出去，一定要具备一些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责任，知道当地民众和市场的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合规交往，而不是采取桌下交易或走上层路线。这是中

国企业展现新面孔的最好时机，也是决定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际上立足、叫响的关键。

对中国企业来讲，“一带一路”不像以往那样是个大杂烩，更不是企业一窝蜂到一个地方。为什么要搞支撑点、驿站，就是有资格有门槛，让我们公开、透明、合规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和当地企业进行合作。

我们之所以在墨西哥的高铁和斯里兰卡的港口项目上出问题，一方面是外国势力阻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国外的企业对当地了解不够，应该更看重对当地的社会责任，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避免反对派和其他方面找到借口，这一点不克服，我们的项目永远走不出去。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有这种问题。

应该再次强调，这次“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国企业走出去时，要彻底打消窝里斗和无序的价格竞争。这一点各部门，尤其是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等要做好这方面工作，我们的驻外部门，特别是使馆的经商参处要发挥作用。

开辟新市场重在共赢

《21 世纪》：在经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也需要打造新的增长点，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能开辟多大的市场？

魏建国：我认为，中国经过了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特区；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加入 WTO，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第三次开放是“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在前两次基础上

更大的开放，是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开放，中国将把最好的东西拿出去。所以这次改革开放在寻找新的市场的时候，一开始摒弃以前的观念把淘汰的产能转移出去。

在寻找新市场的时候，不要首先考虑中国企业的利益，不要考虑中国自己一家的得利，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贯彻合作共赢、多予少取等原则。

“一带一路”愿景规划很重要，愿景就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不能急功近利，这是长期打造的东西，让当地企业、百姓和国家得到好处，觉得中国是个可依靠的伙伴。

我以前在非洲工作，经常讲独家行走得快，同伴行走得远。“同伴”二字在对外关系中可能以后是关键词，我们不会打造同盟，永远是同伴关系，而不是像某些国家为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别国利益，“一带一路”愿景最终体现的是这个事情。

《21 世纪》：现在推进“一带一路”您最关心的是什么？会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魏建国：“一带一路”首先要选择好驿站和支撑点，关键是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把“一带一路”尽快打造成互利共赢的模式。“一带一路”最后能不能受到欢迎，能不能进行推广和进一步发展，最终考验要看是不是可以取得共赢。

“一带一路”最终中国和合作国家能不能取得互赢，能不能和亚投行的其他伙伴取得共赢，互赢和共赢是衡量“一带一路”能否成功的关键，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21 世纪》：就是先打造利益共同体。

魏建国：在命运共同体之前先把利益共同体打造好，利益都一致了，比如这个项目最终得益的是我们双方，那以后就慢慢会走到命运共同体，我最担心的就是利益共同体能否打造好。

（来源：2015 年 3 月 31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河南要在改革开放上布更大的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　张大卫

两年前，国务院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这个“大礼包”给了河南，“大礼包”究竟让河南享受到哪些实惠？3 月 8 日，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卫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航空港区一方面促进了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另一方面推动河南用开放倒逼改革。张大卫说，能不能抓住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这两个机遇，促进转型升级，是我们思考的出发点。

谈体会

总理报告对我们是重大利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

张大卫说：“李克强总理报告中的这段话，信息量很大。总理这样说，说到我们心里了，这对河南是非常重大的利好。”

对于由此给河南带来的机遇，张大卫说，河南这几年的工作就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战略结合起来，我们正好在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支点上。河南近年来积极努力塑造对外开放的高地，实际上也是进一步扩大开放，融入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上来。

郑州航空港刚刚迎来2周岁“生日”，张大卫说，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河南的战略思维、规划、措施是对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另一方面推动我们用开放倒逼改革，用开放促进创新。“就像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讲的，‘河南的转型升级找到了一个战略突破口’。”

谈挑战

抢抓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两大机遇

张大卫说，国务院批准规划时，对航空港区提出五大战略定位，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更多地讨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河南的产业能不能融入全球化，能不能适应全球化，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挑战。能融进去，你的产品就能提升就能有销路；不能融进去，就是过剩。”张大卫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某次到沿海一家生产浮法玻璃的企业考察，这家企业的浮法技术和洛阳不相上下，但为什么这家企业产销两旺，而洛阳的浮法玻璃销售面临很多问题？企业负责人回答说，他们的这套技术是完全和国际大公司进行配套的。加入到全球供应链，加入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中，就有销路，张大卫对此感触很深。

“另外就是新技术革命。”张大卫说，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冲击，我们要主动改造我们的产业。

“能不能把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这两个机遇抓住，促进转型升级，是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张大卫说。

谈方向

以港区集聚产业，以开放倒逼改革

航空港区今后的发展有哪些当务之急，张大卫说，第一件事是通过航空港区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产业集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以此改造全省的产业生态，使全省的经济体系融入到国际化的垂直分工体系中去。在融入的过程中，把河南的市场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出来。

第二件事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倒逼创新，打造一个非常好的国际营商环境。在这一平台上需要做体制机制的创新，培养创新产业、集聚创新人才等。

“我们不是要建一个航空港、修一个跑道，或者发一班郑欧班列，接几个国际邮包，而是要在改革、开放、创新上做更多的文章，布更大的局。”张大卫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只是在河南这片土地上寻求一般的发展，而是要建造有国际品牌意义的城市和产业发展目标。比如，我们现在要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国际商都、国际购物都市型城市等。

对于河南未来的面貌，张大卫说，我们瞄准的是国际上知名的一些城市，向他们学习。“要建设东方芝加哥，建成法兰克福那样的国际枢纽城市和产业集聚城市。”

谈 e 贸易

每天接单量已超 100 万包

作为全国首批五家 e 贸易试点之一，河南 e 贸易从去年“双 11”开始业务量大幅增长。2015 年 1 月的前 10 天，郑州海关就验放进口包裹 22.30 万包。

张大卫说，手机上有两个数据他每天都刷，一个是航空港客流量和货运量，另一个是每天 e 贸易的接单量。“进入三月份，河南 e 贸易平台出现重大突破，现在每天的接单量已经超过了 100 万包，这是井喷式的增长。”

这证明这个平台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符合产业调整和创新升级的规律，也迎合了新技术革命的一些变化。张大卫说，现在搭建的

e贸易平台，创建的“郑州模式”，极具生命力，其理念就是国家有税收、产业能发展、群众得实惠。

张大卫介绍，这个平台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知名电商，比如京东商城、天猫、聚美优品等，也有国际客商向平台上聚集。“我遇见过几十家韩国商人把我围住，他们希望尽快开发河南市场，发展020体验店。我们这个平台不光是进口，还要出口，满足国外消费者网购中国产品的需求。如果我们做起来了，将来会形成一个新的购物天堂。”

国际商都

国际化、繁华、高品质

郑州将“建设以国际商都为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作为今后的发展目标，“国际商都”具体是什么概念呢？

张大卫说，国际商都是一个愿景，就是国际性的商贸都市。首先，交通条件必须便捷、通畅。第二，现代服务业必须发达，新兴商贸城市需要交易，交易需要要素集聚，然后对资源进行整合，看你的金融服务业、物流业能否保障，有没有先进的技术传递信息完成交换。第三，产业体系必须相符，比如法兰克福作为商都，有很强的会展业、金融业，交通也非常好，有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来支持。

张大卫用近乎白描的方式描述了国际商都的模样。“第一，它要国际化，不再是内陆的郑州，而是全国、全世界的郑州。一提到

中国的城市，大家心目中不仅仅是北京、上海，还有郑州。第二，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工作便利，就业充分，商机无限，各种创新创业在这个平台上风生水起。第三，它是一个高品质的城市，交通便利，宜居、绿色，让人心情舒畅。”

郑州角色

重构管理体系，重塑发展环境

国际商都首先说的是郑州，也包括周边的一些城市，比如郑汴一体化、郑州都市圈，张大卫说，这些城市将来都可能是国际商都的有效组成部分，其核心城市是郑州。

张大卫坦言，郑州目前还有环境、交通、文化品位等方面的不足，但不能因为有缺陷就看不到自己的优势。现在要做的就是用国际商都的标准去创建，包括交通、环境卫生、城市管理。

“我们必须按规则来，有秩序，讲法制，一切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来重构我们的管理体系，重塑发展环境。”张大卫说。

“我们向芝加哥、法兰克福这些目标城市迈进，但如果不认真，就可能做不到。在发展环境、制度体制创新方面，如果不培养创新活力，不尊重创新精神，就可能做不到。”张大卫说，过去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郑州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既要目标高远，又要脚踏实地。

（来源:2015 年 3 月 11 日，河南日报）

[成果摘要]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19 期 全球信息化的主要特征及趋势

【摘要】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实现经济的智能化、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并确保在全球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纷纷选择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作为推进产业升级、抢占全球经济发展制高点的主要手段。这些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台了新一轮与信息化相关的战略和规划。研究上述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对于在新形势下实施中国特色新型信息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0 期 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差距及对策

【摘要】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信息化发展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一些指标已处于世界前列，但信息基础设施需要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产业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信息化环境管理能力不足。当前，必须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牢牢把握信息化发展的主动权，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制定新情况新挑战下的国家信息化战略，完善信

息化相关法律法规，加快自主可靠的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应用，规范网络监管，加强信息安全管理。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1 期 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考虑

【摘要】我国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过程中，建设高质量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同时，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过程中，加快制度性建设，实现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从社会领域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创新治理社会。

《研究报告》2015 年第 22 期 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战略格局新变化

【摘要】乌克兰危机爆发与持续，对当今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各主要国家国际战略正将做出一系列调整。乌克兰危机打乱了美国既定的全球战略，特别是“重返亚太”战略。俄罗斯做好了应对西方制裁的准备。北约加快调整战略

部署，积极拉乌围俄，巩固东扩基础。俄罗斯与北约、欧盟的对抗态势进一步尖锐，世界格局进入新的变动周期。中国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需谨慎把握，以务实态度处理复杂态势。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27 期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第 69 期“经济每月谈”综述

【摘要】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 69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演讲嘉宾认为，当前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弱，农业现代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资源环境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流转不畅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等是阻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因素。建议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大中央惠农政策扶持力度，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民解放思想。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28 期 加快推进出租车行业规制改革的五点建议

【摘要】近年，全国各地出租车行业在不触动利益集团利益前提下，以不断提高运价的方式代替了规制改革，规制改革出现了本末倒置，

引发了各界不满。本文分析了其产生的三个方面主要原因，提出了有效解决这类问题的五点政策建议。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29 期 煤炭能否清洁高效利用关系能源革命的成败

【摘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清洁能源发展是能源革命的“币之两面”，工业和生活散烧用煤疏于治理，燃煤发电高效机组普及率不高，商品煤质量差，节能环保装置使用率低，以及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等都是煤炭利用中的主要症结。建议在“降煤”和“替煤”同时，通过控总量、提效率、建标准、强监管、促创新，实现“绿煤”和“节煤”。

2015 年第 30 期 “一带一路”：促进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研讨会综述

【摘要】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研讨会。会议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优势互补，多种文明和谐相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应通过建机制、搭平台、抓重点、促落实，与各方携手共同努力，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智库言论》2015 年第 31 期 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第 70 期“经济每月谈”综述

【摘要】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 70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演讲嘉宾认为，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比预期低，但仍处于合理区间。物价水平虽低位运行，但没出现明显通货紧缩。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发展模式“衔接期”。同时，世界经济发生了四大分化，即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出现分化、新兴经济体增长出现分化、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及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走势发生分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政府改革、全球自贸区战略、劳动力全球跨境流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等是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主要变量。

[国际交流]

2015 年 4 月 14 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日本科学技术与社会论坛（STS）主席 Koji OMI,听取 STS 有关情况介绍，并就双方合作交换意见。交流部陪同。

2015 年 4 月 1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瑞士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李斯,双方就筹办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交换意见。交流部陪同。

2015 年 4 月 10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杨·埃利亚松一行，介绍了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筹备情况，并就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加强双方合作事宜交换看法。经济研究部、交流部陪同。

2015 年 4 月 27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清川佑二，就双方下一步合作进行交流。交流部陪同。

2015 年 4 月 2 日，陈文玲总经济师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助手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关情况，并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交流了看法。战略研究部、经济研究部、交流部、信息部参加。

2015 年 4 月 21 日，陈文玲总经济师会见加拿大外交贸易与发展部助理副部长葛淑珊一行，就“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及中加贸易关系交换看法。战略研究部、交流部参加。

通讯地址：北京市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邮编：100050
联系电话：010-83362170　传真：010-83362176　　网站：www.cciee.org.cn